



20世纪的 最后秘密

何建明 / 著

20世纪的 最后秘密

何建明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的最后秘密/何建明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1. 7

ISBN 7 - 80623 - 264 - 8

I. 20… II. 何… III. 报告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2232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212000 印数 1—4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 作者简介

何建明

著名青年作家、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作家、《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中央党校十七期中青年干部班学员。主要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大国的亮点》、《警卫领袖风云录》、《天堂祭》、《野性的黑潮》等；报告文学集《东方神话》、《漠国大押解》、《缉私大王》、《神秘的禁区》等；长篇小说《东方毒蛇》；电影《西行囚车》；电视连续剧《女囚长》；学术著作《论纪实文学与写作》等。作品多次获奖。

目 录

惊天动地的隐秘生涯 (1)

谁发现了大庆油田 (145)

惊天动地的隐秘生涯



1999年5月8日晚10点,当我在外地采访,顺道回到老家江苏常熟的父母身边时,电话铃突然响起:

“……你看新闻了吗?北约都把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给炸了!今天大学生们和不少市民都到大街上游行呢!”在京城妻子告诉了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我急忙打开父母一直用着的那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我看到了我驻南使馆被炸得血淋淋的场面和首都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使馆前愤怒声讨的镜头……这一夜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是不宁静的一夜。我睡不着,并且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什么竟然在全世界面前悍然对我驻南使馆进行野蛮罪恶的轰炸?

如果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与其相当的话,北约还敢发动这样的野蛮袭击吗?不知怎的,在这个令亿万国人悲愤与深思的夜晚,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我的同乡,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王淦昌院士。因为他在两年前第一次也是他那传奇一生中惟一一次接受作家采访时,留给了我一段让人永远难忘的话。王淦昌先生说:“我从小是个非常胆小的人,连稻田里的青蛙都不敢抓。可我和同事们为共和国研制出了‘两弹’,中国人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年代研制核武器,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也许我们中国人永远不会使用核武器,但我们不能没有这些东西。有了它们,别人就不敢轻视我们。”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在家乡的土地上有位了不起的人物。1964年10月16日,当广播电台传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不久,在我们家乡就有人传言说同乡王淦昌先生是中国原子弹的主要领导者和研制者。出于对同乡人的敬仰之心,我们常熟人一直非常注意报纸上出现的“王淦昌”三个字,然而我和家乡的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始终见不到这位大师的名

字。十几年后,当人类已经迈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关我们共和国研制原子弹等核武器的内幕不再成为“绝密”时,我和我的常熟老乡们才知道原来在历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名单上那位叫“王京”的人,就是王淦昌先生!

一位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在和平时期为了国家的特殊使命而隐姓埋名长达 17 年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王淦昌是一批科学家中惟一为了执行国家特殊使命而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隐姓埋名如此久的一位。

今天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当年参与中国“两弹”研制的一批杰出科学家,他们是被人或称为“两弹元勋”、或称为“两弹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当然还有王淦昌、彭桓武等。那么,王淦昌在这批研制中国“两弹”的科学巨人中处于什么地位呢?

用现在已经公认的中国核武器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的钱三强的话来说:“我的学长王淦昌同志对我国原子核科学基础研究和原子能的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淦昌同志是清华大学第一届(1929 年)物理系毕业生,比我高七届,他在学校时的教授有叶企孙、吴有训等,教师有赵忠尧等。我们在学校常听老师们提到第一届的王淦昌……解放后,1949 年 7 月份为了准备召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曾在北京召开过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会。在这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浙江省代表、闻名已久的王先生。王先生深厚的科学知识、明朗的性格和直率的发言,给我印象很深,当时就想到,要发展我国原子核科学时应请他一起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立即成立以原子核研究为主的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最初设在北京东皇城根、后迁至中关村的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摇篮”的研究所,其第一任所长就是钱三强,副所长则是王淦昌和彭桓武。而身为所长的钱三强从此时起不仅是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许多场合都需要他出面。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还兼任科学院计划局工作，又先后参加过几次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和有关工作，因此所内组织领导责任就落在王先生和彭桓武同志的肩上，而王先生负了主要责任。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订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其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的初稿是由王先生主持拟定的。规划定稿中包括了质子加速器、电子同步加速器的建造，辐射化学的研究和同位素制备等，使得规划扩大了，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核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为1958年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10月改名为物理研究所）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由第二机械工业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的科学技术范围勾出了初步蓝图……”

钱三强先生说的这个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自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同我国一切合作协议后，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准，使其成了后来专门负责研制中国核武器的“九院”（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九院”这个别名在六七十年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心中的“宝贝疙瘩”，常在国家高级机密会议上被提起。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宝贝疙瘩”当时也称二机部的“九局”和“九所”，为了神秘的使命，中央将这个绝密单位有意设在首都西郊的元大都的土城墙边。当时那里一片空旷和荒芜，地上长满了灌木杂草。居住在这里的农家百姓突然有一天发现在自己的田间地头耸起一座灰色的四层大楼，那灰楼很神秘，周围是高高的围墙，门口还有解放军站岗，时常有各种轿车进出。于是“灰楼”便成了当地人的一个神秘禁区，它因此也格外出名。20年后，百姓们才慢慢知道，这所神秘的“灰楼”里便是我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但它早已不再是孤零零的

了，在它的周围已经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在它的左右前后几乎都是宽阔的马路和热闹非凡的居民楼舍。飞速发展的北京城区建设，使往日的“灰楼”如今淹没在海淀区花园路的中央地段。为了写这篇作品，有一天我特意走到花园路，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那是中国人在 20 世纪最值得骄傲的象征物——我们自己造的原子弹！

“九院”（1964 年之前称“九所”）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在李觉将军任院长的“九院”下面，有三位副院长，他们便是主管核试制实验研究的王淦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而这时的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当然是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的研究室负责人。从 1961 年初起，这个承担中国核武器研制使命的“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 1978 年。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并直至 1982 年 9 月。在这期间和之后，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后升任为副院长、院长。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中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周光召同志写下这段对王淦昌的评语时是 1996 年 2 月，此时周光召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作为一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国

家科学机构的首脑人物，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贡献时，在仅有 180 个字且专业名词占了大部分内容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奠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很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两弹元勋”。

在当年我国的“两弹”研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神秘的“国家特级机密”的后帷走到了中国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可以说，在“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后帷的“两弹”研制工作的高层大科学家之一。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央决定王先生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 55 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1980 年 2 月，在邓小平主持下的全国科学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待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当一批“两弹”研制工作的主要组织和领导者纷纷从后台走向前台时，王淦昌已是 73 岁高龄的老人了。他这样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王淦昌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社会职务，但他依然是位并不被公众所认知的神秘人物。其二，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加者即便是一位工地炊事员，也得是“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当时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惟一的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

决策者。据说非党员的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王淦昌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经历了长达17年之久的隐姓埋名的岁月。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就是在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他仍然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王淦昌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在组织允许他结束隐姓埋名生涯后的1979年10月20日，此时他正好72岁。介绍他入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入无产阶级先锋队？这绝不是偶然的，在老先生的入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做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十亿人民、八亿农民的大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端正航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王淦昌是个什么样的人，甚至在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还不是很了解。这是一种遗憾，但同时更说明了王淦昌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大师，他的可贵之处也就在这里。因为他一生孜孜不倦的是科学事业，即便是在从事最崇高的科学研究和取得最辉煌的成就时，他依然甘心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默默奉献。他的入党介绍人之李毅将军，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感人和贴切的话，他说：“淦昌同志是

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做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我发现他具有许多长处：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荡诚恳，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嫉贤妒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上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轻视别人的劳动。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

1997年的一个夏日，我这位整整比王淦昌院士晚出生半个世纪的“小老乡”，终于在北京木樨地王淦昌的家里见到了我久仰的“大老乡”。

“啊，老乡来了，坐，坐。”90岁高龄的王淦昌老先生一口纯正的“常熟土话”，令我心头犹存的几分敬畏之感荡然散去。初次见面，我就惊喜地发现了两件事：一是这位像泰山一般的丰碑人物没有半点架子，二是他的身子骨之硬朗程度令人难以想像。他刚拉着我的手坐在他身边说着我们都已久违了的家乡话，就有电话打来。坐在沙发里的他竟无半点拖沓之感，站起来直奔电话机，其说话的声音也格外清朗洪亮。

那天我问的最多的还是我最感神秘的问题：他是怎么搞出原子弹的？

老先生笑了：“你是老乡，给个例外。”说着，他从里屋抱出几本他的论文集和手稿：“中国的原子弹真正是我们一手搞出来

的，这可不是吹的！你看看，这是我当时为研制原子弹上天绘制的实验草图……”王淦昌老先生随即说：“这在今天仍是绝密的。好在你这当作家的可能什么都看不懂吧？”

我认真地瞅了几页，又认真地摇摇头：“不懂，像天书。”

老先生哈哈大笑起来：“你要看得懂，我就不拿出来了！”

那天我感到特别欣慰，因为老先生的身体尤其是思维的活跃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消去了一切采访的疑虑，于是给老先生留下了一长串问题，相约另一个时间与他长谈。王淦昌院士爽朗地答应了，并在告别时在我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希望你将来成为大文豪”的题词。

之后的不久，正当我忙着为采访老先生做准备时，突然有一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惊人的消息，那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写的“读者来信”。文中说：一位九旬高龄的老科学家在家门前的马路上散步时，突然被一个年轻的骑车人撞倒在地。而那个年轻人见老者倒地后竟然扬长而去。后来是过路的两位年老者将这位老科学家扶起后送到了医院。“读者来信”中愤怒地斥责了那位骑车人，问他有没有最基本的社会公德？问他知不知道被撞倒的这位90岁的老科学家曾经是我国“两弹元勋”？那篇只有二三百字的“读者来信”，立即使我想到了王淦昌。我当即打电话给王老先生的家，接电话的家人向我证实，被撞倒的就是王淦昌老先生。

“现在王老先生怎么样啦？”

“股骨颈骨折，一条腿不能动弹，医生说至少得住院3个月……”

那个可恶的骑车人！他知不知道这是何等严重的事故？老先生一旦有个好歹，将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假如这一撞发生在30多年前我国研制“两弹”时，那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就可能不知晚多少时候爆炸！据说王老先生被撞的消息在报界披露后，

引起国内外的震惊，他所住的北京医院病房里每天有社会各界送来的慰问鲜花，连整个走廊都堆得满满的。然而可气的是那个骑车人一直未露面，至今王淦昌老先生已经离世半年多了，那个骑车人仍逍遥法外，这是天理不容的事。

王淦昌老先生住院期间仍没有忘却接受我采访的事，由于伤势严重最终被医生劝阻，这使我感到极大遗憾，因为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我国一代核科学大师王淦昌先生带着他未竟的事业离我们而去了。在八宝山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王淦昌作为一代杰出的科学大师，获得了应有的褒奖与悼念。

1999年5月9日，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的第二天清晨，一夜未眠的我，忍不住再次来到30年前曾经拜谒过的王淦昌故居，缅怀我心中的大师。当我默默地向王淦昌出生的农舍鞠躬时，那个名叫枫塘湾的小村庄的村民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北约欺人太甚，假如王淦昌还活着，再造几样跟美国一样厉害的武器，看他们霸权主义还敢不敢损害我们中国的尊严！

是的，一个国家的尊严是绝不可玷污的。而一个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就必须有许多像王淦昌这样的卓越贡献者。

那一刻，王淦昌院士为国家、为民族尊严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不由得在我心头重新浮现……

A：三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

王淦昌的一生几乎占有了整个20世纪。而他作为一名享誉

世界的著名核物理学家，他的名字与成就也与中国在 20 世纪曾经出现的荣辱春秋联系在一起。

1907 年 5 月 28 日，王淦昌出生在江苏常熟水乡的支塘镇枫塘湾村。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郎中”（中医师），但死得很早。王淦昌 13 岁时父母都离开了人间，他主要靠大哥和外祖母抚养成人。小时候的王淦昌就读于两所有名的学校，小学他是在太仓的沙溪学校上的，那是非常开明的学堂。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时，沙溪小镇也破天荒地举行了大游行。70 多年后，王淦昌与家人谈起往事时仍然异常激动地说：“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当时虽然年纪很小，可心头觉得能为国家兴亡出点力是很光荣的事。啥叫国家的尊严，从那时就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然而王淦昌毕竟生活在一个旧时代，特别是封建的农村风俗习惯使得他过早地有了一门包办婚姻。在家人的操办下，刚小学毕业的王淦昌在暑假里娶回了一个比自己大 3 岁的裹脚小媳妇，那时“新郎官”王淦昌虚岁才 14 岁。当时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家庭与婚姻，只知道从此家里有个既是媳妇又像姐姐的女人帮他干这做那的，似乎很开心。当了一个多月新郎后，王淦昌被大哥带到上海浦东，进了浦东中学。这是王淦昌第一次从乡下走到“十里洋场”的重要转折。浦东中学第一任校长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先生，当时国内就有“南浦东，北南开”之说。浦东中学的学生在黄炎培先生的栽培下，几乎百分之百地考上了著名大学，如革命家闻一多、科学家钱昌照、教育家夏坚白、史学家范文澜、文学家胡也频以及蒋经国、蒋纬国等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是从浦东中学毕业的。严谨的学风，使王淦昌受益不浅，他在这儿勃发了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和非凡天才。1925 年，他一举考上了清华大学。有趣的是，当这位前程辉煌的 18 岁学子，兴冲冲地拿着清华大学入学通知书向家人报喜时，他的“姐姐”则抱来一个娃儿对他说：“快看，我们